

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

姚爱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

姚爱斌 著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古代文体论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最终成果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姚爱斌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3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0369-9

I. ①中… II. ①姚… III. ①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文体
论—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7050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

著作责任者: 姚爱斌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369-9/I·24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8.5 印张 273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顾问：

启功

主编：

童庆炳

委员：

钱中文 王先霈 程正民 朱立元

童庆炳 郭英德 金元浦 罗 钢

周 宪 陶东风 黄卓越 王一川

李春青（常务） 周小仪 曹卫东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

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惟”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

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过分“社会学”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坚持其二元对立的僵硬的方法，那么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

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展的广阔的空间。

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一般认为，国外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是让人异化，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文化诗学研究就其基本原则说可以有五点：

第一是历史优先原则。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

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尽管绝对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难以追寻，但是无论如何难，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去。过去我们的研究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观点和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化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自然会凸现出来，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的状况。

第二是对话原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前人的文学理论，都是对于作家、作品或原有理论家、理论作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另外，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种对话。对话要真正的平等才能深入地展开。就像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一定要平等相待，充分地恳切和真诚，彼此才能敞开心扉，通过交谈，做到双方都受到教益。我们在对作家（作品）、理论家（理论著作）的研究中也应该是如此。把对象也当成一个值得尊崇的主体，想尽一切办法激活它，让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能够袒露自己的真意；而作为研究者也自然是一个主体，能以商榷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加于人的态度，与对象实现真实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才是比较客观的和可靠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的。

第三是自洽原则。文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圆融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例如其中的阐释、比较，不能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应该在观点和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洽而圆通。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和新的比较，但必须合情合理。所有片面的论述，其中弱点之一，就是不能逻辑自洽。

第四是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学术研究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

术，学术的独立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杰出学者王国维就说得很清楚。但文化诗学的思路则如上面所述，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馈。当然，我们的研究可能不是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不可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那样正面解决社会问题。但从诗学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可以以间接方式回应社会，不也很好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

目 录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本体论	31
第一节 文体即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	31
第二节 文体是有丰富特征的文章整体存在	37
第三节 文体是有丰富构成的文章整体存在	55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方法论	75
第一节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基本方法论的体用论	76
第二节 古代文体论与体用论	83
第三节 古代文体论体用论的微观分析	93
第四节 从体用论角度再解辨体理论和文体范畴的 基本内涵	102
第五节 古代文体范畴重释与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 转换	109
第六节 再论古代文体论研究对象及其与古代文论的 关系	115
第三章 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文类学、“文体学”比较 ...	118
第一节 西方的“文体学”(Stylistics)与 文类学(Theory of Genres)	119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文体学”(Stylistics) 比较	137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体论中的“体”与“类”的关系	144
第四节	徐复观《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的学理缺失	159
第四章	中国现代文学风格论的生成与反思	173
第一节	三论合一：中国现代文学风格论的理论资源及整合	175
第二节	个性的文论：“三论合一”模式形成的历史机制	183
第三节	视角转换：对王元化文学风格论研究对象的重新解读	198
第五章	中国古代文体论范畴体系的整体结构	208
第一节	古代文论（文体论）范畴体系研究中的“范畴”问题	208
第二节	古代文论（文体论）范畴体系研究中的“体系”问题	236
第三节	古代文体论范畴体系的整体结构	247
结语：	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学科构想	268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83

绪 论

一 研究对象的确定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文体论。所谓中国古代文体论，简单说是指中国古代有关“文体”的理论，具体说是指中国古代描述文体现象、辨析文体类别、品评文体特征、分析文体结构、探寻文体源流、指导文体创作的文章理论。中国古代文体论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因其独特的理论视角而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其他部分有所区别，又因其同样以文章为研究对象而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密不可分。

想要清楚说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理论外延并非易事，因为其中隐含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了解“中国古代文体论”这个研究对象的外延是研究的开始，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体论”范围的确定又与研究者对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核心范畴“文体”内涵的理解有关。这是一个常见的理论内涵与外延的矛盾：对理论内涵的理解总是以一定的理论外延（即研究对象）为基础，而理论外延的确定却必须以对理论内涵的某种理解作为逻辑依据。内涵与外延的矛盾是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导致原有理论的内在平衡被打破，并在寻求新的内在平衡中推动理论的发展。有时是因为发现了原有理论内涵无法解释的“例外”现象，然后在建立这个“例外”现象与原有理论体系的联系的过程中，引发了对原有理论内涵的重新思考；有时则是因为发现了原有理论内涵的偏差和漏洞，如对某个对象的理解并不准确等，然

后在修正理论内涵的同时也引起了理论外延的改变。

综观有关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研究，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体论”范围的选择总是与他们对“文体”范畴的理解密切相关。将古代“文体”范畴理解为“文类”（或“体裁”）者，其研究对象便大致限定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诗、文、赋、词、曲、颂、赞、铭、诔、碑、书、记等各种约定俗成的文章类别的论述；将古代“文体”范畴理解为“体裁”（或称“体类”等）和“风格”（或称“体貌”、“体性”、“作风”等）二者，其研究对象既包涵古代典籍中关于诗、文、赋、颂等文章类别的论述，也包括关于不同文类、不同作者、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和不同地域的文章特征的论述。这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研究对其研究对象范围的两种最基本的理解，其中又以第二种理解最为流行。这两种研究模式之间并不存在后者否定前者或超越前者的问题，其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理论取径的不同：后者不过是在“文类”论（或“体裁”论）之外另立了一个“风格”论，以便将古代典籍中更多的有关文章之“体”的论述纳入到古代文体论研究之中。

因为本书的主要目的即是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及其现代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所以在阐述古代“文体”范畴的内涵之前，很难对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外延有一个确切的界定，也不可能与学界已有古代文体论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完全一致。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可以把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外延分两个阶段、先后在两个不同层面进行描述。首先，在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基本问题之前，可以对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外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经验性的描述。也即是说，首先可以将中国古代文体论理解为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文章之“体”的直接论述。这应该是不同研究者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一点，因为这些有关文章之“体”的直接论述是“中国古代文体论”这一理论名称得以成立的文献依据，也是每个古代文体论研究者需要最先接触的原始材料。“中国古代文体论”与“中国古代美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等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后者的核心术语如“美学”、“文学理论”等从名称到基本内涵都主要来自西方语境。尽管近年来研究者在阐释“美学”、“文学理论”等范畴内涵时的本土意识越来越自觉，却并没有改

变这些范畴的舶来身份。而在“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研究中，虽然也深受西方“文体论”（Stylistics，宜译“语体学”）的影响，并且导致了对中国古代“文体”范畴内涵理解的偏差（详见第三章），但是不仅“文体”这一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渊源有自，流播极广，而且中国古代文论内部即已形成了以“文体”范畴为核心的极其丰富的理论表述。因此，与“中国古代美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等相比，“中国古代文体论”是一个从核心范畴到理论形式都相对自足地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生长起来的理论形态。这一理论的基础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文章之“体”的直接论述。

这层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文献非常丰富。据考证，古人以“体”论文在东汉即已出现，汉末蔡邕的《独断》中已有对文类文体的系统说明。至魏晋，中国古代文体论已经发展成型，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的部分内容、傅玄《七谟序》和《连珠序》、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等是这一时期文体论的代表。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成熟期，在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中，“文体”范畴都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此外在大量序跋、书信、史传、论著如张融《门律自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统《文选序》、桓范《世要论》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也有对文体问题的精要论述。隋唐至宋元时期，有关文体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各种诗话、诗格、诗式类著作中，如辑录唐人文论的《文镜秘府论》中的“论体”和“十体”部分、旧题王昌龄撰《诗格·常用体十四》、旧题贾岛撰《二南密旨》、皎然《诗式·辨体一十九字》、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魏庆之《诗人玉屑》、杨载《诗法家数》等。其他如魏徵《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刘知几《史通·载文》、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与《河岳英灵集诗评》、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牛希济《文章论》、姚铉《唐文粹序》等也是品评文体的重要论著。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总结阶段，明代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贺复征的《文章辨体汇选》、祝尧的《古赋辨体》等是辨析文类文体的集大成式著作，蕴涵着

丰富的文体思想。清代的文类文体辨析主要存在于一些大型文集中，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杨绳武的《明文在》等。至于明清两代难以计数的诗话、词话、曲话著作中有关文体的论述更无法一一胪列，如明人杨慎的《词品》、徐献忠的《唐诗品》、顾起纶的《国雅品》、杨良弼的《作诗体要》、李贽的《骚坛千秋诀》、钟惺的《词府灵蛇二集》、费经虞的《雅伦》、谢榛的《四溟诗话》、陆时雍的《诗镜总论》，清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吴乔的《围炉诗话》、翁方纲的《石州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论及文体之处都颇为引人注目。尤需一提的是四库馆臣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书屡从文体角度品评历代文集，很能反映清人对文体的理解。其他如序跋、书信、史籍、传论、文集中谈及文体者，其数量已远非前代可比，也是值得研究者勤勘的材料。

上述直接论述文体的典籍文献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核心内容，研究者一般首先会依据这些文献资料，通过归纳、分析、比较，以把握古代文体范畴在传统文论语境中的基本内涵（这也是本书将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把握了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也即是对古代文体范畴的内在规定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表明研究已经进入了古代文体论更具体的思想层面。在理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之后，再反观有关文论文献便会发现，虽然很多中国古代文论著作并没有直接论述文体，却同样包含着丰富的文体思想，与我们已经理解的文体观念完全相通。至此，便可以在上述第一类研究对象——古代典籍中有关文章之体的直接论述——的基础上，将古代文体论的研究对象扩展为中国古代典籍中一切包涵文体思想的论述。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体论因为不再以直观的语言特征为标志，而是以内在的文体思想为依据，所以其理论外延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会随着研究者对文体内涵的不同理解而涵盖不同范围的对象。将文体理解为“文类”者，其研究对象便是所有关乎文类思想的文论话语；将文体理解为“风格”者，其研究对象便是所有关乎文章“风格”特征思想的文论话语。本书也将会根据论者对文体范畴内涵的理解，在文体思想层面上确定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外延（详见第三章第四节）。

还需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文体论首先是一种理论，是中国古代关于文体的一套理论话语，因此，中国古代文体论并不等于中国古代文体思想或中国古代文体意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从性质上看，中国古代文体思想或文体意识既可以是对文体的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也可以是一种对文体的潜意识经验和无意识的习惯传承。其二，从存在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文体思想或文体意识不仅存在于各种抽象的文论话语中，更广泛存在于历代作者具体的写作、阅读活动以及作为文本形式存在的无数古代文章中；而中国古代文体论则主要是指对进入理性认识层面的文体思想和文体意识的理论表述。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体论与中国古代文体思想及文体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后者是前者得以产生的基础，前者则是对后者的理论总结；前者不断为后者提供新鲜生动的经验，促进古代文体论的发展，而后者也会通过指导作者的写作活动和读者的评鉴活动转化为活生生的文体意识。因此，在具体研究中，本书一方面以中国古代包含文体思想的理论话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注意联系更为广泛深厚的古代文体思想和文体意识。

二 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回顾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几部介绍中国古代文体知识的著作，如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附《文体刍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年）、顾苓丞的《文体论 ABC》（上海：ABC 丛书社，1929 年）、薛凤昌的《文体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年）、施畸的《中国文体论》（北平：立达书局，1933 年）等，但从这些著作的编撰目的和具体内容看，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类文体知识的普及性介绍，因此与其说是对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研究，毋宁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余绪。

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研究是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一起开始的。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前期的近 20 年中，陆